



鲁迅

伟大的教育家

陈根生 著

LU XUN

WEIDAJIAOYUJIA

新疆大学出版社

陈根生著

鲁迅

伟大的教育家

新疆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墨 愚
封面设计 王钧兵
版式设计 李明珠

书名 鲁迅——伟大的教育家

作者 陈根生

出版 新疆大学出版社

(乌鲁木齐胜利路 14 号, 邮编 830046)

发行 新疆新华书店总经销

排版 新疆大学计算中心激光照排室

印刷 新疆大学印刷厂

版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234 千字 插页 4

版次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199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书号 ISBN 7-5631-203-5/O·113

定价 6.00 元

- 1 鲁迅——伟大的教育家
- 17 鲁迅“离文就教”探索
- 28 鲁迅论师和为师
- 41 鲁迅的儿童教育思想
- 51 鲁迅的美育实施
- 67 鲁迅的启发式教学法
- 74 鲁迅的比较教学法
- 85 鲁迅教学特色浅论
- 94 鲁迅谈读书
- 105 鲁迅指导写作的卓越实践
- 115 鲁迅与学生课外文艺活动
- 127 鲁迅谈学习外语
- 138 鲁迅的教学语言

147	“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 ——鲁迅与广东木刻青年
154	中日支谊沃土上的教育奇葩 ——鲁迅与日本青年增田涉
166	封建的儿童教育的悲剧 ——关于《风筝》及其不同意见
175	《高老夫子》与女子教育问题
186	鲁迅与体育
195	名师与高徒 ——鲁迅与青年许钦文
204	附 录 鲁迅的学生回忆鲁迅

鲁迅

伟大的教育家

有人担心,鲁迅并没有留下教育教学专著,称“教育家”似乎不很适宜。

是的,鲁迅没有象梁启超发表《国学入门书目及其读法》、《作文教学法》;象杨贤江刊行《新教育大纲》那样留下教育教学方面的专著。但是实践证明有没有教育教学专著似乎并不应成为“教育家”的唯一标准。作为教育家,决定的还是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教育史上留下的业绩和影响。

应该说,鲁迅教育经历丰富,教育思想精深,不仅不逊色于近代、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任何一位教育家,而且鲁迅关于教育问题的许多精辟见解,卓越实践决不是许多著名教育家都能达到他那个高度的。鲁迅从1909年8月(从收到聘书时间算起)回国担任教职起,到1927年11月离开教学岗位,先后在教育界工作了19个春秋。他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1909年8月—1910年)教化学、生理学、“天物之学”即博物;在绍兴府中学堂(1910年8月—1911年夏)教生理卫生兼监学(即教务主任);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1911年绍兴光复后—1912年2月)任监督即校长;在北京大学(1920—1926年),北京师范大学(1920年—1926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1923年10月—1926年),世界语专门学校(1923年9月—1925年3月)任讲师,教小说史;在集成国际语言学校(1924年5月—6月)任职,授课情况至今未详;在黎明中学(1925年8月—12月)任高中文科小说教员,教高中小说课;在大中公学(1925年9月—11月),任高级中学部教员,教“新文艺学”科;在中国大学(1925年9月—1926年5月)任讲师,教小说学科;在厦门大学(1926年9月—12月)任教授,教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在中山大学(1927年1月—4月)任教授、文学系主任、教务主任,教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在劳动大学(1927年11月—1928年1月)教国文课,仅11月份上过两次课。其间1912年1月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5月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8月任教育部金事,至1925年8月被老虎总长章士钊免职后又于1926年1月复职。综上所述,可知鲁迅曾在多种类型的学校执教,担任过多种教学职务和教学行政管理职务,讲授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所有这些,就使他有条件不仅了解当年中国教育界黑暗、腐败的全貌,而且熟悉教学活动全过程的各个环节,教学工作的酸甜苦辣他是有着切肤感受的。

岂但如此,鲁迅在其一生写作的六七百篇文章中约有八十篇左右涉及教育,表现出来的教育思想,尽管比较零散,但是其中不少意见却是十分深刻的,如果整理起来也相当全面,这是鲁迅对中国现代教育史的一份宝贵贡献。无论是阐述教育的重要:“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①,还是培养目标:“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②,这已经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无论是揭示教育的阶级性:“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③;还是介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④;无论在师生关系上抨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婆媳关系”论,反对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父子关系”论,主张对学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⑤,还是具体传授学习外语的种种有

效方法：“不要间断”^⑧“每日不放下”^⑨“愈会比较，就愈有益处。”^⑩：以及他的工农教育思想，儿童教育思想，社会教育思想，家庭教育思想；以及他对美育的倡导，体育的强调，……说真的，我们几乎在今天教育学研究领域里还很难找到鲁迅当年没有关注过的地方。从大到教育的本质、方针，小到教学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环节、方法，鲁迅都提供了许多精到的意见，至今仍被我国一些教育学专著、论文引为经典用来阐明问题。

其实，鲁迅的一生也是对教育年轻一代倾注巨大热情的一生。从1903年初他与陶成章等27个留日学生给故乡绍兴人民写公开信痛切指出：“我中国空疏陈迂之教育，必不能敌各国之教育；我中国腐败朽蠹之政治，必不能敌各国之政治；我中国枯麻拙劣之工艺，必不能敌各国之工艺”^⑪，一直到上海最后十年，被青年们称为“中国新兴木刻之父”，不辞劳瘁地给他们复信答问，亲临指导，推荐作品，资助经费，“他不啻在家里开了一个义务的木刻函授学校”^⑫。三十多年来教育好下一代象一根红线贯串在鲁迅的全部峥嵘岁月中，成为他伟大一生的一个重要主题。如果说杂文、演讲、书信中还比较容易发挥他的教育思想的话，那么严谨的学术专著就不那么方便了，但是鲁迅仍然在他的文学史、小说史研究论著中因利乘便涉及教育，传布教育见解、学习方法。比如他在《汉文学史纲要·自文字至文章》中写道：“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再如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一讲“从神话到神仙传”中说：

“现在常有一问题发生：即此种神话，可否拿它做儿童的读物？我们顺便也说一说。在反对一方面的人说：以这种神话教儿童，只能养成迷信，是非常有害的；而赞成一方面的人说：以这种神话教儿童，正合儿童的天性，很感趣味，没有什么害处的。在我以为这要看社会上教育的状况怎样，如果儿童能继续更受良好的教育，则将

来一学科学，自然会明白，不至迷信，所以当然没有害的；但如果儿童不能继续受稍深的教育，学识不再进步，则在幼小时所教的神话，将永信以为真，所以也许是有害的。”

一般这类专著中传授知识就传授知识，研究学术就研究学术，行文严谨而不肯旁逸斜出横生枝蔓，但是鲁迅却在字里行间有机地穿插解决一些教育问题，发表一些教学经验，字字句句闪耀着作者作为一位伟大教育家的思想光芒。鲁迅就是这样在其一生中始终如一，孜孜矻矻坚持教育活动的。

也许正是看到了鲁迅对教育下一代时时贯彻、处处关注极为难能可贵。柳亚子称道：“近世对于儿童教育最伟大的人物，我第一个推崇鲁迅先生。”^⑩大家都知道这位老先生是不大轻易嘉许人的，他的这句赞语难道是偶然的么？

既然鲁迅这么心甘情愿挑起教育重担，那他为什么不肯一教到底，而在最后十年却离开教育界呢？是的，有近二十年，鲁迅一直坚持边教书、边写作，但是他对这两方面难以两全其美却有独到的体会。他在离开厦门大学前夕曾写信给友人说道：

“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⑪

在权衡教书与写作哪一样对中国更为迫切需要、更有较大好处时，鲁迅经过深思熟虑毅然选择了后者，义无反顾地扑向了思想、文化的火热战场。许广平肯定了这一抉择的确高瞻远瞩，指出：“鲁迅到上海之后，果然辞去教书，专心一致地做编写的工作了，成绩是比较大的。看他末期十年的写作，是较之头二十年合起来还多到不止一倍，就可以证明。”^⑫如果说鲁迅在东京弃医从文是出于冷静的深湛的思考，那么最后十年离教专文则反映了他炽烈的革

命热情和高远的政治眼光，何况事实上他脱离教学岗位却并没有停止过教育活动，而他尽其所能通过各种方式、途径进行的教育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

郭沫若曾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⑩鲁迅先生当然同样无心做教育家，但他实际上却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写下了不平凡的一页。纵观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与同时代的某些职业文学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相比，他们主要职业即创作，没有或很少接触过教育工作，也有曾从事过一定的教育工作的著名文学家，如闻一多、朱自清、叶圣陶等，他们的成就只限于文学家、教育家的范围，鲁迅则比他们取得了多方面的更高的成就。再放眼一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主要是任职大学校长或教育总长一类的教育管理或教育研究部门的职务；陶行知主要是从事中小学教育普及的试验及其组织工作；舒新城主要是研究教育学理论和教育史；鲁迅的确没有象他们一样专门研究过教育问题，以及终生在教育界服务，教育只是他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所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作为我国文化革命的旗手纵横驰骋英勇作战的一个重要战场。他无论是在理论上贡献精深的教育见解，还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进行卓越的教育活动，取得出色的教育成果，都使他名副其实赢得伟大教育家的称誉而当之无愧。

二

鲁迅作为一位伟大教育家，主要地是在教育战线上的激烈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他向形形色色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进行了长期的不懈的斗争，他与其他著名教育家所不同的地方，更多的是以战斗的姿态屹立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

孔孟之道是封建教育的核心，三千年来根深蒂固，流毒深广。鲁迅于1918年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之作《狂人日记》揭起批孔

大旗，揭穿了封建礼教所谓“仁义道德”其罪恶实质只有两个字是“吃人”，击中了孔孟之道的要害。虽然鲁迅批孔决不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但他目光如炬抓住了中国历史演变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即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总是把“尊孔读经”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把对学生灌输孔孟之道作为学校办学方针和教育课程。1914年12月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公布《教育部整理方案草案》规定：“中小各学校修身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以保存固有之道德；大学院添设经学院，以发挥先哲之学说”，“各学校宜注重训育，以孔子为模范人物。”1925年章士钊主持教育部部务会议又议决，规定小学生读经，自初小四年级读起，每周一时至高小毕业。对此鲁迅立即挥笔上阵作著名杂文《“十四年”的读经》予以抨击，并且在讲演中面对面向青少年学生们振聋发聩地指出：“有些读书人说，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是的。然而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⑥这就再一次戳穿了孔孟之道的虚伪面目，唯其如此，危害更烈。国民党反动派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一次掀起“尊孔读经”逆流，蒋介石公开提倡什么：“四维八德”，要青年学生“明礼义，知廉耻”，“尽忠孝，行仁义，重仁爱，尚和平”，1934年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通过“尊孔祀圣”的决议，后来又定什么孔子生日（8月27日）为全国教师节，与此同时学校也恢复了“读经科”。1934年5月为了配合蒋介石及其卖国和尊孔读经的宣传，上海无线电台专题广播“国学名家”冯明权的“读经讲座”节目，其中一段是讲颜之推《家训》中的《勉学篇》，说什么“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鲁迅敏锐地一眼看出这是反动派在为推行投降主义制造舆论了。于是他立

即揭露道：“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⑨这就一针见血指出，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国难当头的时刻，播起这种圣人之徒家训的叵测之心，这不是教国人准备做奴隶是什么？可见鲁迅批孔批了一辈子，他写下的批孔名篇《我之节烈观》《春末闲谈》《论雷峰塔的倒掉》《“十四年”的读经》《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是我国现代思想、文化、教育史上的名篇佳制。五四当年的批孔名将章太炎、吴虞、钱玄同一个个落伍了，退隐了，独有鲁迅始终坚守在阵地前沿进行不懈的斗争。而且随着鲁迅思想的发展，他进一步把批孔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紧紧结合起来，不断充实进新的内容，使他批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显示了越发鲜明、强烈的政治色彩。鲁迅批孔，其深远影响决不限于教育界，在整个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都有其难以估量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推翻了清王朝，动摇了封建教育的理论基础——孔孟之道，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于是乘虚而入，涌进中国教育界。历史把一场又一场斗争任务现实地推到每一个革命教育家面前。1915年5月，美国资产阶级教育家杜威来到中国。他住了两年两个月之久，足迹遍及辽、冀、鲁、苏、浙、闽、粤等11个省，到处演讲传播他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当然就反对形式主义教育、封建主义教育来说，杜威的教育思想不无某些积极的东西，但是此时此地的中国，实用主义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口号“教育无目的”，普通译为“教育无宗旨”，杜威的原文是“教育除本身以外无宗旨”，却很快被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一眼看中视若珍宝。1919年10月中国第五届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议案，建议教育部废除教育宗旨，1922年北洋军阀政府终于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会”，具体体现了杜威这一主张。鲁迅针锋相对向青年明确指出：“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

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①，“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②他要他的学生充分认识剥削阶级社会里教育的阶级属性是无可避免的客观现实，万不可听信超阶级的教育理论而上当受骗。

20年代我国教育界还时行过一种“教育救国论”。1921年美国另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家孟禄游学中国，以调查为名，极力宣传他的《新教育》。虽然他的学说对中国教育界在厘订学校制度方面产生过很大影响，但是他说什么“中国各种不好的现象，唯有教育能够补救它”的“教育救国”论调却是有害无益的。当时有一部分爱国教育家也看不清孟禄这样宣传的反动性，居然跟在后面梦想以教育代替革命。而鲁迅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他坚定地认为，救国的根本办法不是靠教育，相反要想办好教育，首先必须彻底改造社会。他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象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③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演讲中说：“在劳动大学一方读书，一方做工，这是新的境遇；或许可以造成新的局面，但是环境是老样子，着着逼人堕落，倘不与这老社会奋斗，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④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怎么能离开社会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呢？鲁迅是立足于改造社会这个根本点，就比一些仅有一副热心肠的爱国教育家们高明多了。

为了“救救孩子”，鲁迅探求过“全盘改造”中国旧教育的真谛。他不同意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用教育手段来达到“理想国”的理论，指出柏拉图的那本《理想国》“也还是一部诗人的梦书。”^⑤他还研究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对18世纪中叶法国启蒙运动者、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主要教育作品都有过评说。他对梁实秋曲解《爱弥儿》的教育观点提出质疑的同时，对该书前四编表示赞许。^⑥但鲁迅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把教育放在社会这个大背景中来考察，牢牢把握住改造

社会必须作为改造教育的前提这一当时不少教育家尚未把握的理。

五四以来教育界每一次风云变幻,都强烈地召唤着鲁迅积极参加斗争。他在跟外国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斗争的同时,也从来没有放松对国内出现的逆流保持高度的警惕。五四运动后不久,胡适就别有用心地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他还给青年学生开列出185种所谓“国学书目”,胡说什么“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星,都是一大功绩。”鲁迅当即给予无情的揭露,他给学生们讲演说:“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的事,也还没有大妨碍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⑧鲁迅及时地揭穿了胡适之流诱骗学生进研究室读书食古,企图防范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青年学生中传播影响的用心。五四时期颇负盛名的学生杂志《新潮》第1卷第3号上刊出了一篇署名“史志元”的来信,鼓吹什么《新潮》要做到哲学、文学、科学“三者并重”。该刊主编竟公开在刊物上复信赞同,并表示今后竭力多登些“纯正科学的东西”。为此,鲁迅马上给他写了一封公开信,指出鼓吹“少年专讲科学,不要议论”,是封建复古主义者的阴谋,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这里“发议论”即向旧传统观念宣战;“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即不把提倡科学与宣传革命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要使文化革命服务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鲁迅这封信及时捍卫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确方向,给进步青年鼓舞很大。陈望道同志当时在杭州正是看到了鲁迅这封公开信而深为赞同,才勉力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的翻译工作,得已于1920年5月出版,使这个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件第一次和中国人民见了面。^⑨

30年来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又一次思想斗争中,鲁迅总是冲锋在前,英勇作战。不用说,这一切都是以杂文的形式出现的,

就表现的教育思想来说也不是系统的,但可贵的是这一切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战斗性,既十分及时,又极为深峻,一针见血,寸铁致命,其效果决不在四平八稳的长篇大论之下。有这么一件有趣的事很能说明问题,1927年北洋军阀张作霖为了进一步控制教育界,强行将北京九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当时有这么一位教育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一本正经地和军阀政府讨论教育问题。鲁迅马上纠正道:这就是“发迂论”,他们这些人是办教育么?“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③一语道破了反动政客所谓办教育的真相,提醒教育界对这些家伙绝不能抱幻想。这就比一般教育家高明一筹了。烈火见真金,疾风知劲草。鲁迅高于一般教育家之处正是在激烈斗争中显示出来的,鲁迅作为伟大教育家的鲜明特色正是教育界历次斗争所赋予他的,他的反应的敏锐,认识的高度,剖析问题的深辟,以及过人的睿智,一句话,他的伟大革命家、思想家的气质,通过教育界历次斗争所显示出来的战斗风貌,足以使他在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深深崇敬……

三

当然仅凭在教育界服务时间长,未必能成为教育家;仅凭教学经验多,也未必能成为教育家。蔡元培、梁启超、杨贤江、叶圣陶之所以被人们尊崇为教育家,则是因为他们在教育领域里辛勤耕耘而建树斐然,成绩卓著。我们如今虔敬地向鲁迅先生献上伟大教育家的桂冠,也正是由于他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业绩。

鲁迅于1909年从日本回国之后即投身教育界,他把全付身心都扑在教育事业上。他当时做的一些工作完全是开创性的,白手起家,艰苦缔造,开拓了这项工作发展的基础和方向。比如我国图书馆发展历史上就记载着鲁迅的一份功劳。我国于清末鸦片战争之后,私人藏书楼逐渐衰落,新兴的具有民主性、社会性,以个人手工

操作为特征的近代公共图书馆开始出现。当1909年京师图书馆（即现在北京图书馆的前身）筹建时，藏书既少，制度未备，很不成样子。1912年鲁迅曾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在他任内，一直把创建京师图书馆作为主要工作来抓，亲自参与创建各项具体工作达数年之久。1912年之后七八年间《鲁迅日记》上不时记有这方面的事情，京师图书馆案卷中也有“民二，一，十九部定迁移改组，交周树人等接受报部”等的珍贵记载。今日北京图书馆达到如此宏大规模，与鲁迅当年的远见卓识、辛勤筹划是分不开的。北京通俗图书馆于1913年10月成立，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个大众化图书馆，以普及文化、为广大群众服务为目的，主要供室内阅览，该图书馆更是直接由鲁迅主管。他还别出心裁在该馆附设了一个儿童体育场，置备了一些铁杠、浪木、跳绳、秋千等体育器材供孩子们锻炼身体，这不仅在当时教育事业上是个创举，就是在今天对建设儿童图书馆不是也仍有借鉴的意义么？

鲁迅还是我国最早倡导美育的先驱之一。他在教育部任职期间负责文化、科学、美术诸事项，他不顾守旧派的排斥阻挠，毅然为宣传美育做了不少工作。1912年6月教育部举办“夏期美术讲习会”，鲁迅一个人担任连续四讲，他的讲题是《美术略讲》。1913年2月发表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的《偃播布美术意见书》，是鲁迅为教育部拟的一份官方公文，文中阐述了美术的特点、种类、目的和效用，制定了传播美术的方针和措施。通篇字里行间洋溢着鲁迅对推行美育的沸沸热情。不用说，在我国倡导美育应该首推当年的教育总长蔡元培，他最早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冶感情为目的”，“以德育为中心”，在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普遍施以美育，尤其是在学校“把美育特提出来，与德、智、体并为四育”等进步主张，^⑨而积极支持他推行美育并且付诸实践的，鲁迅可算是最热情的一个。

教材是教师教学的基本材料和依据。对教材建设鲁迅是十分重视的，他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用的《生理学讲义》以及在

北京大学时用的《中国小说史略》讲义，都是他亲手编写，亲自执教，为这两门学科教学开创了先河。一位教授认为：鲁迅编的那本《生理学讲义》（亦称《人生象欤》）“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生理卫生学讲义之一。”“从当时的科学水平看，科学性和系统性都很强，并附有手绘图表七十余幅和生理实验指导，在当时可算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教材。其中许多先进思想和观点，如预防为主的思想，保健卫生的要求和措施，尤其是大力提倡体育锻炼及其卫生，以及注意儿童、青年预防近视、禁止抽烟喝酒等卫生保健方面，实有独到之处，至今仍是我们所应遵循的。”^④为配合生理学教学，鲁迅还编了一份《生理实验术要略》，向学生介绍了14个生理实验方案。这篇《要略》后来发表在杭州浙江省教育会编辑发行的《教育周报》55期上，与徐特立《国文教授之研究》（77期），夏丏尊译卢骚《爱弥儿》，李叔同《唱歌法大略》（二文均载125期）等，并驾齐驱，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教育论文。鲁迅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略》讲义更是成就辉煌，令人瞩目。这是我国第一部小说史专著，从此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史略》对我国古代小说分类、作品年代、题材来源、故事演变、作家生平思想等等，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它系统地分析了我国小说的历史源流和演变过程，清晰地勾勒出我国小说史的基本轮廓；在探索小说和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时，正确阐明了促使小说发展的各种因素；评价和肯定了古代小说优秀作品所具有的进步思想、批判精神和卓越的艺术成就。《史略》问世，坚实地奠定下这门学科的研究基础。郭沫若高度称赞这本书“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⑤。

鲁迅编写教材的杰出之处是，他把教学工作与科学研究紧紧结合起来，高标准地严格要求自己刻苦钻研，匠心独运，勇于探索，敢于攀高。所以他编写的《生理学讲义》《中国小说史略》这两份教材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在中国现代教育事业上作出了不朽的贡献。